

我的奋斗

罗永浩 著

在近三十年的中国，励志书从未如此诚恳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二零零八年，我和我的教师朋友们创办了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为了扩大这个新机构的知名度，我在全国高校（迄今为止大都是在北方城市）进行了数十场演讲活动。由于大部分高校都不允许我们讲商业宣传性质的内容，所以我的演讲被迫处理得非常“高尚”，大都是英语学习或人生奋斗这样比较纯洁的主题。当然，除了目的本身的不单纯之外，所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真实和诚恳的，为了让自己再舒服一点，我们还在征得高校同意后，在现场打出了“非公益讲座”的条幅。

稍后，这些演讲被听众录下来放到了一些大的视频网站上，这些视频很快也像当初的“老罗语录”一样流传开了，最后，我们自己也剪辑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官方版本”放到了优酷网上。到了二零零九年的秋天，陆续有些出版公司开始跟我接触，希望我能以演讲内容为基础，再补充一些关于成长历程的真实故事，写成一本科励志的书。起初我对这个主意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虽然这对机构的宣传肯定会有一些帮助），因为“励志”这个原本比较美好的字眼已经被我们的时代毁得差不多了。在这个鼓吹所有的小草都应该成为大树，所有一米六的矮个子都应该去NBA打球，所有的人都“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所有的人“只要没有成功，就是不努力”，所有在雨天被蛮横的宝马车溅过一身泥的穷光蛋都应该发愤图强努力赚钱买宝马车然后去溅别人一身泥的“励志”观念大行其道的今天，作为有尊严的文字工作者，谁会想去写一本励志的书呢？后来磨铁文化的人告诉我，如果交给他们出，他们还会给这本书配套发行DVD光盘，并且把我的演讲录像放到机场书店的大屏幕电视上播放。如你所知，机场书店的大屏幕电视和“励志图书”市场一样，通常也都是“成功学”骗子们的专属领地。“但这些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就会被他们占领”，《时尚先生》的主编斜江明老师这样教育我，我想了想，就动心了，于是决定写一本有诚意的，不拿读者当白痴的，关于成长和奋斗的励志书，并且把书名定为“我的奋斗”。

开始着手后，我发现这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时间不够用是最大的问题，培训机构的管理工作和教学任务以及牛博网的日常事务加起来，已经使我的睡眠时间没法保障了，而且我写字的速度也一直都非常慢，意识到很难按照合同上的时间进度完成书稿后，我经常很焦虑，因为心理素质不好，我有时候还会为了这个焦虑而焦虑。稿件艰难接近完成时出现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有很多写得很投入的东西最

后发现根本不适合发表，比如青年时代的几段感情故事（因为当事人还活着并且嫁了人，那些事情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隐私），比如新东方时期的经历（因为我现在做了竞争行业，所以一些事情只要一说就成了“恶意打击竞争对手”），比如牛博网的前世今生（因为很多事情要是说出来就再也休想继续在国内做网站了），这些暂时不能发表的内容占了整个完成稿的将近一半，这意味着很多东西要推倒重来，这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有那么几天，我甚至对于要不要坚持写完书稿都感到非常犹豫。

后来.....后来是这样的，一九二五年，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人写了一本名为“我的奋斗”的畅销励志书，九年后，他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篡夺了政权，在接下来的十来年里，他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除了这个坏蛋，好像还没有一个好人用“我的奋斗”这个标题写过书，虽然这不足以证明任何事情，但这个事实总能让我联想到生活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坏人好像总是更勤奋一些。

为了尝试改变一点什么，我最后把这本书写完了，就是这样。

1972～1990，从出生到长大成人

1972年7月，我出生在吉林省和龙县龙门公社，那是我父母“文革”期间被下放的地方。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父母是失手怀上了我，本来是想堕胎的，但是乡下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他们才没有把我打掉。

“你看你，多危险，那时候的医务所要是条件还凑合，你就不能来到这世上了。”我稍稍大一点的时候，他们经常拿这样的话来逗我。在意识到生命苦乐参半之前，我无知地为此出过许多身冷汗，误以为能来到世间是一件格外值得庆幸的事情。他们的玩笑有时候会使我对如果我没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性遐想不已。钻牛角尖的时候，我会连续想上好几天。由于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需要照顾到的可能性比现在多了很多倍。

我脑袋很大，又是盛夏出生的，所以母亲生我的时候很不容易；长大后看了一部详细描写生育过程的纪录片，看得我肝胆俱裂。作为一个崇拜女性的人，我因此在婚前几乎没有过不戴避孕套过性生活的经历。和我一起看过那个纪录片的老同学当中，有几个家伙还能在后来的日子里反复地失手，让女朋友一次次地怀孕和堕胎，这使我意识到，尽管看起来长得差不多，但骨子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如此截然地不同。

说到大脑袋，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和现在流行巴掌大的小脑袋瓜不同，大脑袋大脸蛋还是很吃香的（即便不是唯一吃香的）。我胖多瘦少的前半生虽然没赶上唐朝那样属于胖子的梦幻岁月，但还是赶上了大脑袋受欢迎的最后十几年。按照我的偶像黄章晋老师的说法，我们的语言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为赞美这些年才流行的小脑袋瓜弄出多少类似“面如满月”这样的赞美大脑袋专用的辞藻来。

和大部分人一样，对于五六岁之前的事情，我没有清晰连贯的记忆。为了写这本书，我还顺便查了查google和wikipedia，发现我来到世间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拉撒睡的头几年里，这个世界不动声色地发生了很多事情：尼克松访华并发布中美联合公报；中日邦交正常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倒台；中国政府开始落实计划生育工作；法国废除了死刑；比尔·盖茨创立了微软；CNN开播；曼德拉获释；教父、洛奇、猎鹿人、安妮霍尔、克莱默夫妇获

得奥斯卡奖；加菲猫和机器猫诞生了；齐达内、贝克汉姆、欧文、中田英寿、张惠妹、林志玲、周杰伦、章子怡、金城武、张柏芝、高树玛利亚也诞生了；阿加莎·克里斯蒂、毕加索、李小龙、聂鲁达、汤因比、猫王、卓别林、铁托、约翰·列侬、希区柯克、蒋介石、周恩来、朱德，还有毛泽东和他的马屁精郭沫若，都死了。

我能勉强记起来的第一个家，在和龙县和龙镇的一个大众浴室的后面（那时候父亲已经结束下放离开农村了），是一个二十平米左右的小平房。屋子里是朝鲜式的土炕，进屋就要脱鞋。需要脱鞋的地方除了灶台都可以睡人，所以一家五口人竟然不觉得局促，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住在这里的时候，母亲经常领我去大众浴室的女浴室洗澡。我很早就有了模糊的性意识，具体的表现是，如果被漂亮的阿姨抱，我就会显得很扭捏，但如果是没什么姿色的阿姨抱我，我就镇定异常。但奇怪的是，我对女浴室却没什么异样的记忆，虽然去过很多次，但只是隐约记得到处都是雾气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裸体。

这个房子的院里有根巨大无比的烟囱（长大后我看到家里的老照片，发现那根烟囱只是在记忆里巨大无比），冬天的时候，总是冒着白烟。对于这个房子里的生活，我能想起来的只有一件事。有一次姐姐出去挑井水，我在院子里自己玩儿，突然邻居家的一头猪拱开院子的门进来了。我发现它趴着的身高跟我站着的身高差不多之后大惊失色，掉头跑进屋子躲在缝纫机的下面不敢出来，直到姐姐挑水回家。后来这个经历和我童年时期的其他大量糗事（怕狗、怕虫子、怕漂亮女人、馋嘴偷吃、长期尿床等等）一起成了家里人寻开心的保留节目。在整个国家都严重缺乏娱乐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作为一个家庭里通常对出糗负有责任的老幺，尽管满心不愿意，但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各种需要丢人现眼的任务。

第二个家的记忆也比较模糊了，大概记得是在和龙县印刷厂旁边的一个狭长胡同里。胡同尽头是一个公厕，我每次去大便的时候，旁边那家养的大狗都会大叫特叫一番。我非常怕狗，所以每次大便都很紧张。有一次在胡同里看到那条狗在吃屎，于是就很解气地鄙视了一会儿，但想到这么二的狗我竟然也害怕，又很泄气。

还有一次，在那个公厕大便后发现没带纸，只好分着腿以一种怪异的姿势走回家。后来我发现不小心把屎拉到了裤子里的孩子，也都会无师自通使用那个姿势。那时候听说老一辈的人忘记带纸的时候，会随便找根木棍来解决便后擦屁股的问题，感觉难以置信。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家里人都是拎一张旧报纸去大便。讲究点儿的人家会用铁丝串一叠用剪刀剪过的大小适中的旧报纸挂在门上备用，好像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都是用劣质的印刷品擦屁股的（后来看到书上

说，中国人传统上是敬畏“字纸”的，应该是古时候文盲多的关系吧）。小朋友们在公共浴室里嬉笑打闹互相“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大家的屁眼儿周围都是黑黝黝的（当然有些是因为亚洲人的皮肤色素沉着）。这是我对油墨的副作用的“初体验”。

到了胡同里面的这个家没多久，我就开始上幼儿园了。第一次被送去的时候，我看着满满一院子的陌生人吓得要死，挣扎着要和母亲一起回家去。母亲劝说了半天，关上幼儿园的大门走了。我愣了一会儿，又哭喊着冲上去拼命敲打大门。老师在边上笑着安慰我，有几个小朋友好心来拉我说话，结果被我又推又搯，撕扯中有一个叫骆庆军的瘦小孩子被我失手打中了脑袋。肯定是因为内疚，这个后来跟我并无深交的小朋友的名字到今天我还记得。

在幼儿园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中途觉得有了尿意就很自然地站起来往外走。老师叫住我问明了原因之后，告诉我以后类似的事情一定要举手请示，征得老师同意方能出去。虽然作为孩子的我在家也免不了被父母甚至哥哥姐姐管教，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是我对人生注定失去的那部分自由的最初体验。

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应该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老师，她是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我还能记起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长得漂亮，另一个原因是她糟糕的人品。她大概是让我意识到“生命是残酷的”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人了。

我到了这个幼儿园的第二年，有一次，好像是儿童节，县里搞一个什么儿童活动，所有的孩子都要带着两把花到一个大操场走队列去。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所谓的两把花就是两根有分叉的枯树枝，上面贴上大致剪成花瓣形状的彩色纸片，通常由孩子家长负责手工解决。母亲在食品公司工作，它的隔壁是一家殡仪馆。母亲和在殡仪馆工作的那些阿姨们都很熟，所以在参加那次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两把巨帅无比的、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假花。这假花甚至有纤细精致的花蕊。可想而知，第二天我是横着膀子晃进幼儿园的。在我接受了所有孩子的恭维之后，漂亮女知青老师宣布，大家要把假花都堆放到教室前面的台子上，然后到自己的座位就座。等老师宣布完活动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之后，她又说：“大家走到前面随便拿两把花，不用拿自己带来的，抓紧时间到操场集合。”到了操场集合的时候，我看到那两把该幼儿园历史上最牛的假花刚好拿在上海女知青的女儿的手里，那时候我已经会说刻薄话了（如果不是生下来就会的话），一时没忍住，就说了些“真巧啊”、“咦，你说怎么就那么巧？”、“这事儿要我说啊，简直要活活巧死了”之类的讽刺话。在大家笑得都很开心的时候，我被上海女知青叫到屋子里声色俱厉地训了十

几分钟，最后被告知不用参加这次活动了。在接下来的“叫你妈妈来一趟”的活动中，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思想特别复杂的孩子”。

离开这个幼儿园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正上课的时候，漂亮女知青敲开我们班教室的门，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对我们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讲述我和其他几个坏孩子一起在周末去了她工作的幼儿园，如何砸坏了储藏室的玻璃，如何偷走了孩子们的零食玩具，“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西瓜”。后来知青她们最终弄清楚了那个偷东西的孩子是谁（也是我们大院的一个孩子，这个坏小子凑巧有一件跟我一样的暗绿色夹克，而且背影和我很像。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哥哥的名字却还记得，因为很扯淡，叫“文豪”），但是她并没有再次来到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向我们班主任说明情况。这使得我在离开和龙县之前，一直被同学们当成是一个小偷。

25年之后，我在四川参加赈灾活动的时候，偶遇一个老朋友，她告诉我她在上海碰到一个老女人，自称是我幼儿园时期的老师。上海女人对她说：“我一直都很喜欢罗永浩这个孩子……”这可真是一份难以承受的感情啊！

经历了好几年被恶狗骚扰得连大便也不得安宁的生活后，我们终于再次搬家了。这一次的家，是在和龙县体校的后院。从这个房子开始，我的记忆就比较清晰连贯了，那时候应该是八九岁。

这个体校后院的小区（那时候还没有“小区”这样的名词）里，大都是县委机关人员的住宅，所以通常被叫做“县委大院”。因为父亲当时是和龙县县委书记，所以我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斗嘴时经常被无辜挤兑：“你牛逼什么呀？显你爸官儿大？”我从小口齿伶俐兼凌厉，嘴上不曾吃过任何亏，但落了下风的小朋友只要耍无赖祭出这句话，就能憋得我当场说不出话来，于是“败部复活”的小无赖们纷纷点头：“是啊，不就是显你爸官儿大嘛。”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大院子弟”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除了个别孩子会在班里炫耀家里有电话（那时候家庭电话还很罕见）。我也没见过我们这些“大院子弟”仗势欺人的现象，反倒是经常看到“大院子弟”被出身普通家庭甚至是贫苦家庭的小混混打得鼻青脸肿的，比如说，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除非是被打得严重到了足以构成伤害罪，否则在事后的追究上，“大院子弟”的家庭通常也没有怎么强势。以我小时候见过的一些例子来说，常常是当官的家长在孩子挨打之后，为了显示自己不会仗势欺人，还坚决拒收对

方家长送来的医药费用。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时不时地在家乡的校园里听到类似这样的对白：“我操！老三昨天打的那小子是王市长的儿子，这下惨了！”那十来年间，中国官僚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劣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和龙县体校的楼体上，和同时代的很多建筑一样，用红色的油漆刷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觉得能按照要求做到这八个字的人都会精神分裂。

体校的院子里，是我们小孩子当年玩游戏的地方。最常见的项目是打溜溜儿（玻璃球的东北土称）、打杏核儿、打“Pia-Ji”（土话，一种用纸折成的四方形东东）、踢毽子、跳木马。应该是受了中国旧式文人的影响，我小时候总觉得体育方面好的孩子，比如打球踢球拿手的，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夯货。这个落后的观念一直到了我30岁之后才在脑子里逐渐清除掉了（相比之下，同样愚昧落后的贞操观念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就解决了）。

我小时候常玩儿的那些游戏里，只有踢毽子和跳木马算是有点健身作用的民间体育项目。我踢毽子踢得非常好，只是因为胖且腿短，所以姿势很难说是不滑稽，所以时常被岁数大一些的孩子们取笑。我那时候最讨厌别人叫我“胖子”，一有小朋友叫就会翻脸。今天想来，真是难以置信地蛮不讲理，一个胖子被叫做“胖子”怎么竟然可以生气呢？我成年之后虽然脾气还是很不好，但是变得非常讲道理，典型的例子是常常自称“胖子”，多半在下意识里——除了装可爱——也是有补偿心理的。

我们那时玩儿的“跳木马”，其实是“跳人马”。大家轮流跑步跳过一个大致弯成木马形状的倒霉孩子的身体。该倒霉的孩子在每一轮跳越结束后，就调整一下姿势，使“木马”变高一些，直到有人因为太高跳不过去，就成为下一个轮值的倒霉孩子。我虽然胖，但在胖子里却是身体非常灵活的一个异数，跳木马的时候成绩总是排在十几个孩子里的前三位，很少有机会做牛做马。领略过我跳木马的风采的小朋友们，背地里都曾心情复杂地说我是“飞猪”、“长翅膀的猪”。我为此喜怒参半地心里纠结了很多年，后来在录像厅里看到洪金宝的功夫片之后，就只剩生气了。

住在这个家的时候，一天凌晨我起来到院子里小便，在雪地上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那是一个大概有一米多长的脚印。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透过篱笆墙的缝隙看过去，另外两个脚印分别在两边的邻居家院子里。我回到屋里躺下，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等到了家里人起床，我拉着他们到外面看时，那些脚印已经被厚厚的积雪彻底覆盖，几乎无法辨认了。现在想来，那次应该只是做了个梦。我要到近三十

岁才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和那些因为基因和智力上的原因注定只能接受科学的达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最终相信了科学，是有一些偶然因素的。其中一个不太严肃的原因是，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的人，我受够了那些鬼鬼神神总不肯大大方方地露面显灵，我生气了。

也许是基因上的缘故，我从小就胖，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是非常缺油水的。我好像没有上一代人的那种关于饥饿的记忆，但是有很多关于肚子里缺油水的记忆。印象里总是要熬到过年的时候，才能放开肚子吃上几顿肉。由于缺米，也经常吃土豆饭，那是一种一半大米加一半土豆煮成的饭。我一直都受不了熟萝卜的味道，所以后来看日本电视剧《阿信》里的那些人吃“萝卜饭”的时候，还庆幸过自己没生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些米，长辈们经常要主动吃更多的土豆。他们用饭勺在锅里努力地躲着大米盛土豆的画面我还记忆犹新。

孩子们耳濡目染，也学会了照顾比自己更小的孩子。有一次哥哥期末考试，母亲不知道到哪里弄到了两个鸡蛋煎了给他，但因为只有两个，就不许我吃。那时候流行的“现代迷信”是给考试的孩子吃一根油条加两个鸡蛋。我看着鸡蛋咽了半天口水，哥哥就背着母亲偷偷夹了一个给我。这类关爱的细节，和他小时候对我的残暴殴打一起，都令我终生难忘。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哥哥打我，都是因为我先惹他。我是一个注定下拔舌地狱的人，哥哥的嘴就比较笨，时不时地被我气急了就只能动手解决。有一次我惹毛了他之后拼命地跑，从院子冲进屋里躲到了父亲的书房，回手锁上了门。哥哥晚了一步，只好隔着门上的方块玻璃看着我喘粗气。我看看父母下班的时间快到了，就决定暂时不出来了，于是坦然隔着玻璃冲哥哥做鬼脸。哥哥当场崩溃，连工具都顾不上找，直接赤手空拳打碎了玻璃，拎着血淋淋的拳头进来把我做掉了。硬币的另一面是，在懂事之后，我又渐渐发现，当一个人择善固执的时候，这种欠揍找揍的滚刀肉性格，可以很自然地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他要不是这样的一个王八蛋，他也坚持不了这么久”，我办网站的时候，对这一点感触尤深。

因为大米不够，所以家里经常要用其他的粗粮充主食，经常吃的就是玉米面煎饼和玉米面的面条。为了让家人咽下这些多年后被称为“健康食品”的劳什子，家庭主妇们发挥聪明才智，把它们料理得花样百出。但是在食用油和白糖这样的调味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的年代里，这种难为无米之炊的挣扎通常换来的都是不懂事的孩子们上了饭桌后残忍的反应：“妈，怎么今天又是玉米面啊？”

除了永远都吃不够的肉之外，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就是水果罐头和麦乳精。在那时候，这些都是只有生重病的住院患者才有资格享用的奢侈品，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生重病的人显然都是没有什么胃口的。想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水果罐头和麦乳精（也许还有其他的好东西）都被那些吃不出什么味道的人吃掉了，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不诡异的。

因为有些回忆的细节拿不准了，所以我写作时给母亲打了几次电话，谈到缺衣少食的话题时，母亲的嗓门顿时提高了：“你可没赶上过缺吃的！你哥哥姐姐好像都赶上了苦日子，但是你没有，你一直都吃得很好！因为我后来去了食品公司上班，所以就连猪肉，你也是经常吃的！我还经常从单位买内部处理的酱肉给你们吃的。”

除非是赶上一个生活水准每况愈下的时代，否则每一代人好像都会觉得下一代吃的那一点点苦是微不足道的。母亲去了食品公司后，我们确实吃到了比一般人家多一些的猪肉，但是我不提醒的话，她已经不记得了：那些每隔一个来月才能给全家人吃上一次的酱肉，都是用病死的猪经高温消毒后做成的，这在今天应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了。而且所谓“经常吃”的猪肉，也只是偶尔在炒青菜时，点缀一下而已。所以过节的时候，摆满了一桌子的青椒炒肉片、韭菜炒肉丝，总是一眨眼功夫，就全成了素菜了，就连技术上显然难以被轻松地这样操作的洋葱炒肉末也是同样的下场。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渐渐发现饭后的剩菜里居然有肉，于是大家感慨起来，觉得日子真的过得好一些了。

那时候有一个风靡全国的小人儿书（因为当时全国每年也就出那么几本书，所以好像所有的书籍都是风靡全国的）叫《七把叉》，讲述的是一个贫民窟长大的巴西苦孩子，天生大胃王，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后来参加吃货大赛成了明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最后在一次国际大赛中活活撑死了。我相信整整一代的营养不良少年，都曾经希望过自己能像七把叉那样，生得胃大，死得饱满。

我比同龄的大部分孩子看书要早一些。只看小人儿书的孩子，习惯把没有图片全是文字的书籍叫做“大书”。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看过很多本“大书”了。我发现这能让我在学校里获得很多意外的满足感，比如女同学敬佩的目光，还常常伴随着悦耳的感慨：“罗永浩，你懂得可真多啊。”这种和阅读本身带来的快乐同样强大的力量，

驱使我读书读得更勤快了。我这辈子做过的绝大多数看起来不错的选择，都不是完全被一个纯粹而又崇高的动机所驱使的：当我勤奋读书的时候，除了喜欢读书，我也知道这会换来一些现实的好处；当我择善固执和坚持原则的时候，除了清楚这是我希望坚持的，我也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好的名声和影响力；当我努力把事情做得漂亮又敞亮的时候，除了确实想把它做好，我也知道这会让很多人喜欢上我；当我对朋友够意思、对女朋友关心体贴的时候，除了我愿意这样，我也知道这会让他们受到感动……很惭愧，我从来都不是那种浑然天成、清澈纯净而又全无自知的真人。

因为买不起太多的书，我把家里能看的旧书都看完了之后，经常到父亲工作的县委机关图书室去借书看。负责借书的阿姨长得很清秀，不知道她是真喜欢我，还是因为她是父亲的属下，总之她对我很好，经常跟我开个玩笑之类的。可惜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卖弄小聪明，总忍不住要在大人面前抖个机灵的那种讨厌孩子。也许是因为我卖弄得太多，后来她见了我就不是很有兴趣跟我说话了。长大以后，我也见过一些像我小时候那样喜欢卖弄的孩子，感觉讨厌得不得了。由衷祝愿那些被我的童年折磨过的无辜的长辈们，在后来见不到我的岁月里，都能过得好一些。

回忆起少年时代，让我总想忏悔的另一件事情是，当我牙尖嘴利地修理那些跟我抬杠的男同学时，班里不懂事的女孩子们的傻笑每次都能激发我愚蠢的冲动。于是一场单纯美好、全无恶意的小孩子斗嘴活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通过侮辱朋友来讨好女生的兽行。我会永远为此感到羞愧，年轻不是理由，至少没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见过很多没这么傻的小朋友。在意识到我的这种愚蠢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作为一个擅长逃避责任的文艺青年，我又把我小时候犯下的错归咎于那些没有判断力、只知道傻笑的女同学们，认定她们是“命运安排给我的阴谋”，经常心中抱怨，总觉得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些傻姑娘，就断然不会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到了二十五六岁，我才想明白要求那时候的她们比那时候的我更懂事也是非常无耻的，这使得我人到中年回忆起青年时代，再一次羞愧不已。我希望类似的反省能使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少做一些晚年的时候想起来又要“一张老脸，涨得通红”的事情。

没过多久，县委机关的图书室里，我有兴趣看的书就所剩无几了。因为和龙县公共图书馆的一位负责人是父亲的旧识，所以父亲就让我去县图书馆找他借书看。去了几次之后的那个暑假，父亲的那个朋友让工作人员以后直接放我进书库自己挑选书籍。盛夏时节，一个人在巨大阴凉的书库里自由自在地徜徉翻看，是我童年时期最幸福的几个回忆之一。

今天回想起来，大部分引起我最初对阅读的兴趣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糟粕，比如《杨家将》、《兴唐传》、《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等等。这些书籍里充斥着弱智的历史观和军事观（如果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就必须去借一把宝刀也算是军事活动的话），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封建迷信。那时候的大部分书籍，在前言里都会加上官方的八股说法：“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撇开这种思想审查和控制的合理性不谈，这些观点今天有很多我都是同意的。我总觉得看着这样的垃圾长大，虽然不一定会让孩子们变傻，但在启发智力、启发思考的方面，多半是没什么好处的。希望后来的孩子们，能够在童年时期有更好的传奇故事和魔幻作品可以看。

我记得那时候看到的所有外国小说，也都会注明“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性，原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我们进行了适当的删节和处理，以免对青年读者们产生误导……”。后来发展进步为“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性，原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但相信广大读者能够自行甄别，所以我们没有进行删节和处理，希望大家阅读时注意……”。同一时期的社会进步还包括，“怎样用革命精神克服手淫恶习”的扯淡，经历了“手淫真的对身体有害吗？”这一纳闷儿阶段后，最终演变成大大方方的“医学专家黄教授认为：适当手淫对身体并没有危害”。再晚一些的时候，《知音》、《家庭》这类杂志上的婚姻爱情问答里，赵文革老师的忠告“切莫将身轻许人”也变成了“怎样开明地看待婚前性关系——与温曼丽博士一席谈”。

我这辈子上的第一个学校，是和龙县胜利小学。当时的和龙县城里，一共有四个小学，名字都很热情，分别叫作胜利、前进、建设、光明。

刚入学没多久，老师教导我们，早晨上学的时候，在门口、操场或是走廊上，总之除了教室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见到老师，要记得主动敬礼问好。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发现，如果见到老师的时候真的这么做了，就会被老师表扬，会被说成是“懂礼貌的好孩子”。于是很多孩子到了学校后不急着进教室看书，而是到老师可能出没的所有地方去巡逻，希望能“碰上”老师，这样就可以“顺便”敬礼了。开始的时候，我也兴致勃勃地在路上“遇到”过好几回老师，也相应地受到了几次表扬。我小时候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很喜欢老师夸我，但总觉

得长期寻衅滋事般地找老师去敬礼是一种很别扭的行为。有时候几个孩子排着队“遇到”老师，争先恐后敬礼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是传说中的拍马屁，所以后来就不太好意思再去了。

有一阵子学校里天天教“五讲四美三热爱”，我对这个“五讲”和“三热爱”没什么感觉，但对“四美”的印象就很深刻，因为我觉得我的同班同学里，凑巧有四个女孩子长得都很美。每次老师说“五讲四美”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把她们挨个念叨一遍。写到这里，我赫然发现，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她们中的三个人的名字，而全班三十来个男同学的名字，却只能记起两个了，其中还有一个是因为跟某个名人重名才记住的。

我能记起来名字的女同学里，有两个是长得非常难看的胖姑娘。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她的名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几乎全班同学的小报告，她好像还是个什么班干部。另外的一个我记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我一个人的小报告，而且她也是我的同桌。那天的语文课上，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写信的时候，称呼要空两格写，不要顶格写。于是我举手站起来表示，这个说法和语文教科书上的不符，而且据我所知，大家写信的时候，称呼好像都是顶格写的。老师满脸不耐烦地跟我辩论了几句之后，粗暴地要求我闭嘴坐下，并提醒大家以后要按照她的要求写信，不许再啰嗦，最后还撂了一句：“老师三十多年都是这样写信的，还没见谁说过我写得不对呢。”我忍无可忍，就在下面嘀咕了一声：“三十多年都写错，只能说明狗改不了吃屎。”结果被这位孙姓的胖姑娘告到了老师那里，转天老师就派了她上高中的儿子课间的时候过来暴打了我一顿。

我小学时印象比较深的两个男同学，都是胖子。其中一个叫周胖子，我跟他没什么交往，只记得他只是因为他脸上永远都是夸张无比的骄横之气，经常在一副粗黑框子的眼镜后面瞪着一双牛眼睛，突然走过来问你类似这样的问题：“你知道‘里根’的‘里’是哪个里字吗？”你要是感到莫名其妙因而有些发愣，他就会不屑地用眼角瞥你一下然后走开。

另外的一个胖子姓魏，比我还胖得多，所以我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玩。魏胖子少年老成，也读过很多书，经常给我讲做人的大道理。我偶尔“积极要求上进”的时候，会听得心里暗暗佩服，但大多数“拒绝进步”的时候，又会把他那些金玉良言全都损得一钱不值。很多年后，周星驰红了，很多艺术理论工作者们开始研究他。这些人模狗样的评论看得多了，我就学会了一个词，叫做“消解”。（后来我的年纪大了，就把“消解”搞得比较严肃和有意义了，比如我总去打我的博客文章的著作权官司，在中国，著作权官司的审判结果总是很荒谬，很“助

长歪风邪气”，讨厌的是做出这么弱智的判决的法庭还总是板着脸假装神圣。于是我就一直坚持打，因为每一次法官宣读一个愚蠢的审判结果时，都不得当庭念出我的博客名字：“傻逼老愤青”，于是“傻逼”这个被认为是“脏话”的字眼就会一次次地从法官神圣的嘴里冒出来，冉冉升起，在法庭上空游荡。）

魏胖子的母亲是饭店的大厨，印象里他家常年都是扑鼻的饭菜香气。只是我生性腼腆，从来都不好意思在别人家吃饭，所以很多次在饭点儿去他家，在他母亲盛邀我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是流着口水咬着牙坚称“真的不吃了”、“刚在家吃完”、“很饱，一点也吃不下了”。后来四表哥从外地过来在我家里住了一阵，其间他第一次上班赚了钱，知道我馋饭馆里的菜，就请我吃饭。我们去了魏母掌勺的那家餐馆，吃了两盘堪称人间至善的锅包肉和溜肉段，令我终生难忘，但那一次回家后，两人被母亲一起骂了一顿。她认为我还小，肠胃的抵抗力弱，而餐馆的东西卫生又差，所以不该去吃。我小的时候人品方面有很严重的缺陷，一看到母亲发作，就赶紧把可怜的表哥卖了，谎称我本不想去，是表哥非要我一起去之类的。他为此有将近一个月都不怎么理我，今天想来，还是觉得很对不起他。再一次，我觉得年龄不应该成为行事如此糟糕的借口，在我的同龄小朋友里，我也见过很多人是不像我那时候那么不堪的。

除了总吃好东西，魏胖子的家还有一点让我羡慕不已，那就是过年的时候，他家里的烟花爆竹总是非常多，除夕夜要放掉大概二十多块钱的样子。这些钱能买足足好几个大口袋的量。那时候大家的月薪水平都是三四十块钱。这意味着魏胖子家过年，单是烟花爆竹，就要烧掉一个人二分之一的月薪。这在每年只被允许燃放一两块钱鞭炮的我看来，实在是值得为之战栗的幸福。那时候我永远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对春节期间扰人的鞭炮恨之入骨。

魏胖子的邻居家，也有我们学校的两个孩子，弟弟跟我是同班的，哥哥要大出三岁。本来大家的关系都是很好的，天天放学都会一起走。有一天在路上我和那个弟弟打闹，闹着闹着不知怎么俩人就急了眼，明明是那个弟弟先惹的我，但大三岁的哥哥居然不劝阻，而是冲过来不由分说跟弟弟一起殴打我。旁边的好朋友们好歹拉住了他们两个，但事后在我表示不解的时候却纷纷批评我的“糊涂”：“操！他们是亲哥俩，哥哥当然要揍你啦，换了咱们是他哥也会这样的啊。”我本来想说：“谁说的？换了我是他哥，我就不会这样。”但是看了看他们的表情，就没有说出口。这时候魏胖子说：“谁说的？换了我，我就不会这么做。”这是我对“知己难求”和“吾道不孤”的最初体验。

上了初中之后，我不得不面对更多这类涉及到是非判断的暴力问题，在去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里，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回想起来好像无限漫长的青春里，除了每个孩子都会感到迷茫的性问题之外，暴力问题也常常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在我校某个同学被“敌校”的某些同学打伤后的报复行动的计划会上，我以我认为很正常的方式询问了受伤同学挨打的原因，结果换来的是一堆白眼和“这个节骨眼上，你还问这个有劲吗？”的表情。为了不被伙伴们孤立，我在心里不是很理解的情况下，以超出实际需要的积极性参与了群殴，换来了大家的谅解和尊重，然后我们得知我校同学挨打受伤的直接原因是他之前调戏了“敌校”打人同学的女朋友。接下来让我更加困惑的是，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人的同学中的大部分人这时候仍然纷纷表示“这不重要”。

那时候，在我的同学朋友里，好像连一个魏胖子这样的都没有了。

从体校大院的正门口出来，往西走上不到半小时就能走到一座大桥，桥下面就是海兰江。星期的时候，母亲会经常带上我们到河边去洗衣服。那时候姐姐已经算是大人了，每次去了都会帮母亲洗衣服，没人理我的时候，我就高高兴兴地自己躺在微微有点烫的鹅卵石滩上晒太阳。闭上眼睛，眼前是一片阳光透过眼皮的那种暖暖的红色，耳朵里只有静静的流水声和间或响起的洗衣棒槌的敲打声。远处的桥上难得有车辆经过，偶尔有也是牛车马车，完全听不到噪音。如果拉车的牛偶尔“哞”的一声，就会觉得整个世界更安静了。妇女们洗完了衣服，也会在石滩上躺着休息，也许是因为劳累，她们大都会睡上一会儿。我躺够了，又没人陪我说话，就会走到河边找块大石头坐下，挽起裤脚把腿泡在沁凉的水里发呆。那时候天空湛蓝，阳光充足；轻轻抚摩过小腿的河水清澈见底；空气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好闻味道；洗干净的衣服在河边的树枝上随风微微晃动，石滩上舒舒服服地躺着十几个懒洋洋的女人，所谓“岁月静好”，应该就是这样吧。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跟着父母搬家离开了和龙县，后来就再也没回去过。

1984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那时候延吉只不过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地方，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都市。我永远都记得之前哥哥告诉我延吉市共有26所中小学给我造成的震撼（相比之下，2000年我在北京见到二〇六中学的牌子时，只是怔了一下就走开了），“你知道延吉市总共多少个中小学吗？”进过城、见过世面的哥哥对着只知道胜利、前进、建设、光明的乡下弟弟牛逼哄哄地说，“傻逼我告诉你吧，一共有十三中，十三小，你就算去吧！”很多年以后，我看到武侠小说里提到一种硬功夫叫做“十三太保横练”，理由不是不跳跃地，我突然想起了当时哥哥的样子^__^。

搬家去“大都市”的那天，我想来应该是非常兴奋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细节全都忘了，只记得路上晕车呕吐。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停停吐吐，吐吐停停，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终于熬到了新家，一口气松下来就昏睡过去了。傍晚醒过来上厕所，发现这个新家竟然有一个神奇的功能性房间，叫做“卫生间”。想到从此再也不用冬天零下三十度的时候走到屋外去一个四面漏风的木板茅房亮出屁股，或是夏天在满满一池蛆虫的粪坑上忍着呕吐艰辛作业，我夜里失眠了。

除了这个卫生间，这个新家其他方面倒也没什么先进的地方，仍然有传统式的大灶台和土炕，只是贴地的朝鲜式土炕变成了离地一米多高的中式土炕。没有土炕的客厅，冬天取暖是靠一种叫做“土暖气”的东西。我始终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要浪费煤炭去烧那个倒霉的土暖气，因为客厅烧了土暖气之后也跟冷库差不多。除了冬天最冷的那几个月，我都喜欢在这个客厅里待着，因为客厅里有一套布沙发。作为一个土炕上长大的孩子，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觉得躺在松软的沙发上看书是非常奢侈和惬意的事情。因为怕弄脏沙发无法拆洗的布面，母亲永远用一个做工繁复笨拙、看起来异常丑陋的沙发套包着它。我提醒她如果一直这样用下去，那我们到了要扔掉这个沙发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没有以它原来漂亮的样子用过哪怕是一天，这显然是很不划算的。但我的提醒并没有改变什么，好像那个时代每个家庭最终扔掉的沙发的布面，都是光亮如新的。经历了工业落后、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这样的强迫症，就像经历过饥荒的人们宁可把吃不下食物倒进胃里一样。后来家里开始有了进口电器的時候，他们又开始用各种塑料薄膜去折磨家电遥控器去了。

关于这个客厅，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小学最后一年的假期酷暑难挨。我和哥哥姐姐三个人就索性躺在凉凉的地板上看电视，看着看着都睡着了。半夜醒来，我发现我和姐姐身上盖着同一条毛巾被，我大惊失色，一脚踢开被子坐起来，只觉得满满一脑袋都是“这可如何是好？”那时候，我和这个国家的很多同龄孩子一样，以为男女只要躺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就会生出孩子。我坐在地板上愁断了肠子，姐姐兀自睡得酣畅。我想叫醒她一起“商量对策”，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最后只好爬起来回自己房间伤脑筋去了。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我一直提心吊胆，后来观察到姐姐没有任何异样才慢慢放心了。

因为学校里基本不教（只是发一本没人能看懂的书了事），再加上没有今天这么多的非正常渠道，所以我的很多同学一直到初中三年级，对“生理卫生”也全无头绪。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体育课大家踢完了球，在操场边坐着休息。一个家住学校附近的小混混（好像是已经毕业了几年的同校师兄）叼着烟过来跟我们这些孩子吹牛放炮，吹得性起，顺便给大家上了一堂真实世界里的生理卫生课，让我们彻底弄清楚了父母们是怎样弄出小孩子来的。他绘声绘色地把全部细节讲完，我们都惊呆了，沉默了半晌，突然听到一个孩子尖锐的童音，“操！别扯蛋了，谁爹妈敢那么干啊？那还不得让警察抓起来毙了？”

搬到这里没多久，我们发现对面邻居家里有一个大胖子。他歌唱得极好，还喜欢开着窗户跟着录音机里的歌声丝丝入扣地合唱。我们家人有那么一阵，都以为他家所有的磁带全是二重唱版本。后来胖子结了婚，也许是新娘不许他再跟着唱了，我们才渐渐听出那些歌其实都是独唱的。胖子看上去总是很严肃，街坊里的妇女们背后议论起来，都觉得一个胖子这么严肃是很滑稽的。这应该多少给我留下了一些阴影，所以后来我也成了大胖子之后，就不好意思太严肃了。

在这个家我们只住了一年，所以留下的记忆并不是很多，只有一件事，是因为母亲经常提起，所以现在还能想起来。有一次母亲去广东出差，狠心花了大价钱给我和哥哥买了在广东刚刚时髦起来的旅游鞋，但那时候在边疆的小破城镇里，视觉效果华丽甚至是刺眼的旅游鞋实在是太超前了。我和哥哥偶尔壮着胆子穿出去，每次都被朋友们围观嘲笑：“我操，你穿的这是啥他妈玩意儿？”即使是马路上的陌生人，也没有放过我们（以他们夸张的目光）。后来我和哥哥只好把鞋扔到仓库里再也不敢碰了。母亲坚持不肯扔掉，她要耐心等待家乡人

民的土鳖观念跟上来再给我们穿上。这一等就是四五年，到了延吉市的大街上陆续有人开始穿旅游鞋的时候，我和哥哥的脚都已经长得太大了。

我的小学最后一年，是在延吉市北山小学校读完的。对这个学校，我没有太多的感情，能回忆起来的，大都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问起冬天那些倒霉的风除了冷风、北风、暴风、疾风还可以用什么词，我就大声答了朔风和寒风。结果前排有个满脸傲气的漂亮女生扭过头来很不屑地看我，好像我调戏了她一样。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韩枫；上了几天课后，有一次课间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一个姓朴的坏小子欺负同学，我忍不住说了两句公道话并与之小规模推搡，结果放学的时候这家伙居然拉来了三四十个小混混要打我。幸好他把规模弄得实在太大，大得超出了实际需要，以至于惊动了几个在操场远处聊天的老师，包括一个教导主任，我才得以免遭群殴；我在和龙的时候，学校里也有很多坏孩子，但净是些又傻又愣又坏的，到了这里，开始陆续领教了一些阴险诡诈的坏孩子，刚开始很不适应，见得多了才慢慢淡定下来；班里有一个曹姓的小美女同学，我很喜欢她。她好像有严重的泌尿系统疾病，所以老师特许她课上不必请假可以自行去厕所。每次她满脸歉意和腼腆地进出教室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疼，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班里的同学和老师都不喜欢她，于是我也不喜欢他们了；有一个姓初的男同学，小小年纪为人处事比较大气，所谓的“很爷们”，我对他颇有好感，但因为经常惹事，家里又不管（好像是只有爷爷奶奶带他），于是班主任对他公然表示彻底放弃，“以后学校不管你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课上对全班同学提出任何要求时都不忘残忍地补上一句，“初××同学不用遵守这个规定”，这使我感到很寒心；在到了延吉的头半年里，因为我会讲一些和龙县独有的土话，所以经常会被操一口延吉市独有土话的同学们嘲笑。我一直到近三十岁，都是一个敏感和易于受伤害的人（当然，我用了那么久才把自己弄得皮实禁揍，只是因为我花了很多精力在如何把自己弄得皮糙肉厚的同时依然保持敏感的优秀品质这一任务上），多半是由于这些不愉快。我在这里上学就特别没热情，不久我的学习成绩就明显下降了。

在和龙县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里转来过一个姓解的外地学生，感觉他很聪明，但不知道为什么，自暴自弃得很厉害，总是跟老师和同学们作对，于是大家就都不喜欢他。在老师的眼里，他还是一个给优秀班级拖后腿的祸患。这好像使他的性格变得更乖张孤僻了。那时有同学告诉我说，在他原来的学校，他竟然是班长，学习好，工作也好，同学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只是他来自一个比我们那里还落后的小地方，又有些口音，刚来的时候就被一些同学笑话过他土气，于是就颓掉了。成年后的观察和思考使我觉得转校好像对小孩子很容易造成伤害，我见过很多类似的例子。我在北山小学的一年多里，状态一直不是很好，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新人，很难融入到已经有了四年交情的一群老同学当中去，何况为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理由，我还从感情上经常抗拒融入他们。好在这个学校我只读了一年左右就毕业了。稍后上了中学，同学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全都重新来过，就又没事了。

关于北山小学，最难忘的一个记忆是，那年寒假前，全校学生（也许只是四五年级的学生，记不清了）每天下午都被要求穿上一种特别恶心的传统服装，到操场上集体排练，扭一种特别白痴的东北大秧歌，然后在元旦期间集体上街表演。我很清楚地记得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很愤怒，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幸运的坏小子（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老师不让他们参加）之外，我们都被迫屈从了。我在学校尝试过消极抵抗，非暴力不合作等手段。后来班主任把家长叫来谈话，我又试着跟父母抗议、哭诉、哀求等等，结果全都失败了。最后那天被逼着上街出丑的经历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很多细节对我来说，还都像昨天发生过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带给我的是那么巨大的屈辱和挫败感，但这个不重要。如果这个国家的笨蛋校长和笨蛋教师们在这二十年里没有什么进步，那我至少希望现在的父母们变得好一些了，希望他们不会再逼孩子们去做他们认为是屈辱的事情了。

1985年，按照家庭住址划分学区，我去了延吉市第六中学。同一年家里也搬到了离原来的房子只有几十米远的一个新住处。我的整个青春期全都是在这个二层楼的房子度过的，所以对它的记忆最深。可惜那里现在已经全拆掉了，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和变迁的时代，虽然理性地说应该是好事，但有些平凡的小幸福，比如上了年纪的时候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去怀旧一下，也就成了奢侈的事情。

好像是从搬到这个家的时候开始，人们即使在白天也要锁家里的门了，至少在我的家乡是这样。在这之前，社会治安一度好得让今天的人们没法想象，虽然不至于像古书上说的那样“夜不闭户”，但那时候白天有人在家的话，锁门确是极为罕见的作风。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经济发展逐渐起步，犯罪率也随之逐渐上升的那些年代，我也曾无知地跟着一些长辈们感慨过“人心不古”，感慨过“早年间的治安可是真好啊”。那时候我不知道之前“真好啊”的治安，是以剥夺了很多人们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实现的。当然，过去的治安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之前的中国人家里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偷的。

我在六中时，前两年的班主任非常糟糕，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好像所有的学生都瞧不起他，大家编排了无数糟蹋他的故事和段子，尽管他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以至于使得这些编排活动变得没有多大必要了。我离开这个学校后的十多年里，在家乡陆续认识了一些同样是他的学生的朋友，最大的要比我大十来岁，最小的比我小五六岁。聊起这个初中时期的班主任，大家的一个共识是，一个优秀的烂教师，是可以“打败时间”的。

印象比较深的另一个老师是教英语的崔老师，三十多岁，很严肃，黑框眼镜，笔挺的藏蓝色中山装，非常有型，还有好听的男中音。他好像什么都好，除了不喜欢我。当然，他不喜欢我很正常，我一直都不肯好好学英语，成绩差，而且上课从不听讲，总是低头看课外书。有一次他在整个年级搞英语书法比赛，我也写了一份交上去，他看了很怀疑，就让我当面写一次给他。他看完没了话，怔了一会儿，又“哼”了一声，就严肃地走了，转天板着脸给了我一个一等奖，然后又不理我了。如果他知道多年以后，我竟然成了中国第二著名的英语教师，想必也会严肃地再“哼”一声吧。

初中期间我暗恋过一个女老师，她二十多岁，白白净净，清汤挂面的垂顺长发，有时候也会扎成一条马尾巴，无论扎上去还是放下来，都清秀得让我有些呼吸不畅。每次上她的课，我都会放下课外书很专心地捣乱，她被惹得真生了气，就会提高嗓门瞪着我喊一声“罗永浩！”然后就说不出话了。这样的時候我会低头趴在桌子上老实一会儿，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喊：“她又叫你的名字啦！”

有一次我分寸掌握得不好，把她气得哽咽住了，就丢下我们冲出了教室。同学们顿时高高兴兴地嬉笑打闹起来。我不放心，就一个人跟出去看，发现她在走廊里站着，扶着墙边的暖气片，肩膀一耸一耸地在哭，从后面看过去，雪白的脖子上，几缕细细的绒毛让我心惊肉跳。我呆呆看了半晌，想伸手拉一下她的胳膊以示安慰，但终究不敢唐突，就低头走开了。这之后一直到毕业，她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我再在课上捣乱，她就放下书本，停下来看天花板或是窗外，直到我讷讷地说不出话来，她才又接着讲课。

后来发现亦舒有一个中篇小说《我这样爱她》，讲述一个中学男生暗恋女教师的故事，我胸口酸痛地看到这个跟我一样苦命的孩子说：“每一年至少有两千多个男学生爱上了女教师，虽然我尽力与自己说我没有那两千个庸俗，但是，心里还是知道好不了多少……”

又过了很多年，看了些探讨青少年心理的文章之后，我才能较为完整地梳理我的行为动机和心理。当年她只不过20岁出头，在我今天看来当时她也是个孩子，希望她在后来的日子里，能明白那个讨厌的坏学生其实对她没有任何恶意。这是一段永远不可能被表白的绝望爱情，只是一个傻小子笨拙固执地希望引起他仰慕的人的注意而已。

我在演讲里批评中国的制式教育并回顾我的成长经历时，经常提及的，都是那些摧残学生的恶劣教师。但在教过我的老师中，其实也有些很好的老师是让我心里时常感念的，比如六中的语文老师李老太，物理老师李伟明，和初中最后一个班主任彭老大，他们都曾经给予我信任，并对我付出过足够的耐心，但是因为我那时烂泥扶不上墙，着实辜负了他们，回想起来，不是不愧疚的。

高中时让我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位教语文的刘灵老师。她很年轻，也是二十多岁，目光清澈，面容清秀，短发清爽，声音清亮，走路也很轻盈，有轻微的跳跃感。无论课上课下，她说话总是情绪很饱满，富有感染力，在普遍无趣又严肃的中小学教师群体当中，她甚至还拥有难得的幽默感。在她的课上，我很少看课外书，也从不睡觉。

高中入学后不久，有一次留作文作业，标题大概是“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我就写了一篇集体劳动的真实记录交上去，文中除了描述我对劳动的真实感受，也有很多对这类作文的八股式谎言（比如“我们擦着辛勤的汗水，都觉得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啊”）的冷嘲热讽，风格应该都是比较阴损。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作文被刘老师在第二天的课上当众宣读并大加赞扬。我小时候很喜欢被老师当众表扬，但遗憾的是那一次刘老师当众夸我的时候，我没有在场。那天早晨我迟到了近二十分钟，后来一路小跑冲进了教室，看到我突然冒出来，刚刚听了我的作文的全班同学顿时哄堂大笑。我不明就里，站在门口发呆。刘老师山清水秀地站在讲台上笑吟吟地看着我，直到同学们的笑声渐渐平息了，才温言示意我坐到座位上去。这场景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被我无耻无厌的回忆一次次地添油加醋，以至于现在想起来已经完全不真实了，美好得像是顾长卫拍摄的一个电影画面。

后来我的作文总是写得格外用心，每次看到她字体娟秀（嗯，她的字体好像其实是比较凌乱的，我不管了！^_^）、充满激励的红笔评语，都觉得很幸福。我起初只是喜欢刘老师的样子，后来觉得她又是如此地识货，就索性爱上她了。我不擅掩饰，所以很多同学都看出了我的心事。我辍学后，同班同学李堃有一次吃饭时还骗我说：“其实她也挺喜欢你的，我听人说的。”我知道这绝无可能，但还是轻易地劝自己信了。

和这个国家大多数有点想法的孩子一样，在我十来年的校园生涯里，几乎每一次尝试表达真情实感的时候，都会被那些智力、知识、思想和道德水平都明显有问题的教师们打击，通常的评语都是些“阴阳怪气”、“思想复杂”、“哗众取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满脑子谬论和歪理”。对于这样伤害感情的学校，我心中并没有存下多少值得回味的记忆，但刘老师对我的赏识和鼓励，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例外，让我终生难忘。最终长大走进社会之后，我也是类似的遭遇和感受：尽管会碰到无穷无尽的混蛋和笨蛋，但总会有一些人，让你感觉到生命的温暖和满足，让你感慨生命的“不虚此行”。

有一次，刘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写道，“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我30岁之前就知道我在文字创作上永远都达不到我希望达到的高度了，但还是很想把稍后出版的一本杂文集献给我的刘灵老师。

在暗恋女教师之余，我也忽明忽暗地恋过一些女同学。我对女同学的暗恋开始得比较早，所以到底哪一个算初恋已经没法追溯了。如果从初中时算起，那我的初恋就是六中同班的一个女生。她总是剪一头短发，性格也有点像假小子，很少有男生喜欢她。虽然我通常偏爱的是长发且斯文的女孩子，但不知道为什么，竟一意孤行地迷恋她。我们只做了一年同学，她就随父母搬家离开延吉了。有幸和她同学的那一年里，我经常痴痴地盯着她看，有时候她发现了，就会腼腆地对我笑一下。我觉得自己的目光很深情，但后来交往过的女朋友们都说，当我对着喜欢的女孩子深情凝视的时候，从别人的眼中看来，刚好是我最猥琐的时候，这样看来，当年还真是难为她了。

……那好吧，那时候我经常不得不猥琐地凝视她，时间一长，她的两个闺蜜就发现了，以后我再看她，她们就会看着我微笑，虽然年纪相仿，但我总觉得她们笑的时候很慈祥，就像MSN表情里的“书呆子”（尽管她俩都不戴眼镜）一样慈祥。到了她家快搬离延吉市的时候，也是这两个善良的女同学提前透露给我的。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天起，我的每一刻都是在焦虑和无力感中度过的，那时候我行事畏手畏脚，竟然一直到了最后也没敢表白，如果可能，我真想穿越时空到当年的我的背后推上一把，或是踹上一脚。终于到了她搬家的那天，我骑了自行车到她家门口附近去看，她出门看见了我，没有显得诧异，仿佛是意料中的。我没敢说话，远远地站着看她，她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父母，又看了看我，没有跟我打招呼，低头上车了。两辆载满杂物的汽车在胡同里艰难地向外开动，我骑自行车在汽车前面远远地蹬着，好像带路一样。我用双手交替扶着车把，笨拙地左拐右扭我的胖腰，不停回头张望，中间拐到几处接近直角的地方，我就停下来等一下，看到她的脸隔着挡风玻璃重新出现，才又紧蹬几下。应该是一条很长的胡同，一眨眼就到头了。出了胡同口，我下车站在路边，看着汽车从我边上缓缓开过，车窗里，她扭过头来，用没有表情的眼神盯着我看，最后她终于抬起了雪白的手，朝一边挥动了一下，但还没来得及挥动回来，就永远消失了。生命残酷无比，尤其是对孩子，为数不多的安慰之一是，它总算还有些美感，至少在记忆里。

另一个没有正式追求过的女朋友，是初二时从外省转校过来的一个女孩子。她长得很漂亮，瘦瘦高高，经常穿一件暖色的高领毛衣，总是笑得很温婉。因为说家乡话会被同学笑话，说东北话又不会，所以说的是一口刻意的、略显笨拙的普通话，在我们这些塞外的浑小子听来，美好得一塌糊涂。起初是跟我比较熟的一个男同学先看上了她，他为了追她，就安排了一个外校的小兄弟在公共汽车上调戏她，然后他从后排突然冒出来英雄救美，把他事先付过费的小兄弟拉下车暴打了一顿。演出倒是没有穿帮，但显然火候掌握得有问题，事后她跟很多同学说，她虽然感谢他，但觉得他打人时看起来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她喜欢善良一些的。

那之后她就不大坐公车了，于是几个跟她一样住在郊区的男同学就争先恐后地要求用自行车放学时送她回家，我刚好就是善良系的，又住在她回家的半路上，所以偶尔也会送上半程，再把她当成接力棒交给住在郊区的其他同学。每次她坐在车上拉着我的衣服出发的时候，我都会打起精神给她讲我猜想她会喜欢听的东西，送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每次中途交接力棒的时候，她都显得很幽怨。我又惊又喜，于是逼她点头表态，从此不再交棒，天天自己跑完全程。很快班里的同学都拿我们当小俩口，我们好像也有意无意地秀过些恩爱。

但好景不长，没多久我就觉得和她在一起其实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渐渐地感到跟她实在没什么话可说了。这时候我发现感情问题远比我那个年纪所能理解的复杂，我对她没有过任何承诺，但结束这样淳朴的来往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我是说我们甚至没有拉过手，但这件事怎么看都像是始乱终弃。那几个住在她家附近的男同学的眼神也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坏人，我克服不了沉重的良心负担，所以一直硬着头皮送。后来她渐渐察觉到了，就坚持不再让我送她，每天一放学，就早早走在前面，坐一个同路的男同学的车子走了。看着她瘦弱愁怨的背影，我心如刀绞，我坚信我没做错什么，但总感觉自己禽兽不如。我们来到世间，本不想互相伤害，但是由于年轻，由于造化弄人，我们确实伤害和被伤害了。接下来的寒假，有一天晚上我在家读闲书，林清玄在一个著名的短篇故事里说，“除非有雪崩，但雪崩也不能保证永恒”，我看了看神色木然坐在边上看电视的哥哥，只好恨恨地跑到院子里的雪地上痛哭了一场。

再后来的一个女同学，是我正式追求过的第一个。她是从其他学校转来的，长得只能说是顺眼，但气质很好，肤色白，戴一副黑框眼镜。知识分子气质的女性，一直是我无法抗拒的类型之一（我年轻时还暗恋过严肃的龙应台老师），奇怪的是，当时班里的很多不读书的浑小子居然也喜欢她，和我一起整天围着她打转。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陆续死了心，都以为只有我有戏，但实际的情况是，她对我从来没有过任何表示。拖了整整一个学期后，我下了狠心鼓足勇气约她出来表白，那天傍晚，在她家楼下的胡同里，我被告知她的主要顾虑是因为我们民族不同（我是个朝鲜族），将来不可能获得双方家庭的同意。一个初二女生面对男同学示爱时有这样深谋远虑的反应让我备感邪门儿，这使得我事先准备好的所有紧急应对措施集体失效，我慌不择路，还给她讲了会儿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你记得上学期历史课上的那个故事吧，其实……”最后，我还是失恋了。

在我长大成人之前，和大部分的傻孩子一样，感情上的得失总是伴随着愚蠢的面子问题，由于没法躲避知道前因后果的同班同学，我的那次失恋格外的难挨。我上中学时又不幸读了很多文艺小说（包括《琼瑶全集》！我是我知道的人里唯一读过《琼瑶全集》的奇男子），加之性格敏感及生活经验不足，总觉得此生注定是郁郁而终了，谁知道活到后面，越活越没气质，越活越不惨绿，越活越欢天喜地。

不知道是哪天开始的，青春期突然就来了，一些本来只是好看的女同学一夜之间就在我的眼里妩媚起来。曾经为“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之类的屁话热血沸腾过，但什么东西“忽如一夜春风来”，顿时觉得缺手缺脚乃至缺胳膊少腿好像也没什么了。

男同学们凑在一起闲聊，说的没有一句是人话，即使有女生在场，也会说很多故作隐蔽的齜齜话。我在很长一段日子里，听到什么都会联想到性，比如看到民国故事里的军阀讲话，“诸位都是读书人，兄弟我是个大老粗。”马上产生的反应是，吹什么牛逼啊？

当时看过一个不是很好笑的笑话，说是法国文化部长到美国访问，参观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部长站在大门口抬头向塔顶望去，看了一会儿，突然“扑哧”笑了，美国人问“怎么了”，部长笑道，“这让我联想到性”，美国人笨笨地追问，“为什么会联想到性？”部长愣了一

下，只好说，“我看到什么都联想到性。”有那么一阵子，我觉得我们全都是法国文化部长。

对一群法国文化部长来说，那实在是一个灭绝人性的年代，那时几乎所有的女明星都是政工干部气质，只是眉眼比寻常的政工干部好看些。偶尔有看起来像女人的珍稀女星，也全然跟性感无关，比如面容姣好的龚雪和洪学敏。在我的青春期，在大陆的女星里，除了那些活色生香但是默默无闻的国民党女特务扮演者，我唯一的性幻想对象就是麦文燕，她穿什么衣服都像国民党女特务，即使是邮递员的整脚制服。我简直不敢想象她要是穿护士装或是警服会是什么样子。和历史上很多懵懵懂懂的伟大人物一样，她以为她什么都没做，对自己抚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苦难心灵和肉身这一事实浑然不觉。

希望那些喜欢用“枪打出头鸟”这样的道理教训年轻人，并且因此觉得自己很成熟的中国人有一天能够明白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而不是专门躲枪子儿的。

很多半途而废的理想主义者喜欢说，我本来特别崇拜某某某，特别佩服某某某，是某某某当年启发和激励了我走上了信奉自由民主的道路，但是后来，我痛苦地发现某某某变节了（或是露馅了），从此我觉得什么都是骗人的，我什么也不信了。每次听到这种没出息的论调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心里骂娘，干！原来你是某明星的粉丝，我他妈还误以为你是某种理想的粉丝呢！——做你该做的，做你认为正确的，不要为了谁而做，当走在你前面的人没出息地倒下或是变节的时候，你应该感到高兴：你走到你的偶像前面了，多牛逼啊。

当我们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去斗争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是为了自己信奉的思想和原则，而不是为了对那些认为自己并不需要它的人民奉献什么。想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心态平和地面对任何所谓的“恩将仇报”。很多时候，有理想的人能够继续坚持下去，靠的不一定是坚强，而是想得透澈。

我不鄙视说“脏话”的人，我也不鄙视不说“脏话”的人，我鄙视那些仅仅是因为听到别人说“脏话”就鄙视他们的人。我不知道那些不说“脏话”的人面对说“脏话”的人时那种弱智透顶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

长期以来，被惯坏了的中国娱乐圈名人，总是在做了恶心事儿被公众骂得鼻青脸肿时，一本正经地要求大家给予所谓“善意的批评”。这些拿了钱、露了脸、睡了女演员，随即就才尽了的宝贝儿导演们，总赶着逢年过节的时候，以大投资、大宣传、大傻逼的烂电影骗走人民的钱币，是什么样的茁壮信念支撑着他们，使得他们敢于要求备感被干的人民群众做出“善意的批评”呢？

由于我擅长摆生活态度健康积极的造型，所以我的学生都以为我没有情绪消沉的时候。实际的情况是，当我面对普遍存在着的丑恶现实的时候，常常会短暂地感到厌倦，感到人生虚无，但和那些因此“看透了人生”后变得犬儒的笨蛋的区别是，我会因此加倍努力地去尝试改变现实。因为我知道，正是每一个放弃了理想的人，使得别人的人生变得更加丑恶、艰难、令人厌倦甚至是虚无的了。

每一次民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会有“高人”蹦出来指点说，某市人民的胜利跟某市人民的所作所为没什么关系，现在这个结果只不过是高层斗争的结果，某市人民只是棋子而已。姑且算他的“棋子说”是事实吧，但问题是，如果某市人民没有勇敢地站出来，高层斗争中客观上对他们有利的一方拿什么做棋子将死对方呢？做你想做的，做你该做的，不要为了怕被利用而选择不作为。

看各种各样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我总是替那些获奖者们着急，总觉得如果我是获奖者，会把获奖感言说得特牛逼。但可能是因为我时间全都用来考虑怎么做获奖致辞了，所以最后什么奖也没得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帮家伙做一个笨笨的致辞，然后把奖品领走了。

成为一个教师，是我小时候所能想象的最诡异的职业选择，更诡异的是我还没来得及相应地调整好心态和造型，就又被不由分说地扭送到了相声界。在我谈不上无奈但确实是尴尬异常的前半生里，好像净是这样的遭遇：喜欢读书但受不了弱智教育只好选择退学；常常被认为“显年轻”但不到三十岁就被人叫成“老罗”；爱钱不爱名却成了一个有名的穷人；跟一群文盲做同事的时候只是因为聊天时不介意说“脏话”就被认为“没素质，没文化”；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顺便讲了些自由民主的常识，就被号称是“天之骄子”的群体当成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始终想追随一个值得跟的老大但被现实逼得只能自立门户，呕心沥血地做了一个综合性内容的网站，却被政府和人民一致认定为是一个关心且只关心政治的网站……经历了这么多弄人的造化之

后，我还能感到骄傲的是，我仍然保持了心态的健康和人生观的强悍。但为了吹牛的快感把这个说了出去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又被喜欢我的人们善意地描绘成了一个贩卖剽悍的傻逼：几乎所有来找我的媒体都会以这样的形式开场或是收尾，“罗老师，记得您曾经说过，剽悍的人生……”

■我们有种教育恐怖主义，反复跟家长与孩子暗示，你若没有读过好的大学，一生就完蛋了。你并不是这种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反而是一个成功者（即使世俗的、功利的标准也是如此），你反恐怖的策略与技术是什么？

*我小的时候算是读书非常多的那种孩子（至少在一个小城镇上），因为这个底子，所以平常跟身边那些公认优秀的孩子（通常也就是那些学习成绩好，注定能上个好大学的）交流交往的结果，总是让自己更有自信。实际上，我要不定期地自我反省才能克制住那种愚蠢的优越感。教师和父母长辈们的暗示或明示对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我小时候也时不时地忍不住耍个小聪明，抖个机灵什么的，所以他们也没觉得我这种孩子要是上不了大学就完蛋了。当然，后来离开家乡那个小城镇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了我的“聪明”、“机灵”、“读书非常多”都是很有限的。另外，这种令人憎恶的教育恐怖主义一直存在的原因也很让人无奈，毕竟在中国，对于一个来自农村或是小城镇的年轻人来说，到大城市读一所大学，仍然是改变命运的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那时候真正相信的东西和那些老师和长辈总挂在嘴上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就是“知识改变命运”，但总是和他们产生冲突的原因是，他们实际相信的不是知识改变命运，而是学历改变命运。

■你最希望牛博的读者得到些什么？他们得到了吗？

*首先当然是希望他们通过阅读优秀的文章得到思想上的进步和愉悦，另外，也希望那些平时在生活中常常感到自己是“一小撮”，是“分子”的人来到这里之后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我想这两点他们都得到了。不过说到第二点，我想他们在牛博得到的太油腻了，我是说，我不介意牛博成为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右派愤青们的集散地，但我肯定不希望牛博成为一个没有思考，没有判断，只有立场的右派粪青们的大本营。这样的右粪和我们熟悉的左粪一样令人厌倦。

■你的女朋友看媒体上的星座文章并跟你讨论，你会生气吗？

*不会，但我会很难掩饰我的不耐烦，结果常常是，她会生气。

■运气不谈，你身上的那些品质是你受益最大的？你能让它具有普适性吗？

*应该是坚持原则这一条吧。对第二个问题我没有把握，因为不知道别人怎么定义这个“受益最大”。

■你会韩语吧？韩文的“罗永浩”怎么写？如果不会，你会内疚吗？

*会，我是双语地区长大的。韩文是生造出来的拼音文字，完全符合读音规则，所以能说韩文的人，只要认识字母，就基本都能写，我现在的系统没法输入韩文。如果不会写我也不会内疚，虽然我从小到大总是听到朝鲜族的长辈们说什么“你是个朝鲜族，怎么可以不会写朝鲜文字呢？”这一类的屁话。如果我将来移民到英语国家，我也不会逼我的孩子学汉字，除非他自己有兴趣。

■有人说，个性决定命运，你的性格对你的生活、工作、交际各有过哪些影响？比如，进入新东方、离开新东方、创办牛博网，这些选择和你的性格可能是有关的。你觉得你的性格适合创业吗？

*性格的影响当然很大也很多，我和很多我喜欢的人物一样，多多少少有点自毁的倾向，人生追求的是牛逼，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这解释了为什么新东方上市后，很多讲课不灵但活得很刻意的阿猫阿狗老师都一夜暴富，而该校最著名的罗老师却还在为照顾好父母老婆孩子发愁。做牛博网也是一样，要做名人博客的话，我们也不是拉不来名人，但是像新浪那样找一堆娱乐圈和生意圈的文盲在那儿人模狗样地假装码字……呵呵，我觉得那不是名人博客，那是丢人博客。我们丢不起那人，所以只好办了个牛人博客。

我想我的性格本来应该是不适合创业的，不过我年纪大了变得越来越能控制自己，再加上责任感也越来越重了，对家庭，对朋友，对相信我的人都是如此。所以在自己特别熟悉的领域内和朋友们一起做点事情，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哪些人事、经历对你影响很大？它们影响了你的人生走向。你对自己的性格满意吗？

*对我的人生影响比较大的，通常都是书籍，而不是身边的人和事。自己的性格？我对自己的性格很不满意，我脾气很差。

■ 你觉得自己出名是偶然还是必然？我觉得，出名除了偶然因素，背后一定有实力上的原因。你自己平时是怎么“努力学习”的？

*还是偶然的因素大一些吧，毕竟到一个私立学校去做个英语教师肯定不是一个可以充分预期结果的成名之路。说到实力，我显然是因为“扯淡”的实力而不是英语方面的实力受到关注的，这个基本上是天分。当然我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个努力就是克服自己在当众讲话这方面存在的心理障碍。很少有人知道我本来是一个对着一群人讲话就会汗出如浆的人，直到在新东方教书的第五个年头，我仍然会时不时的在课堂上感到紧张。我演讲的时候常常在下面的听众已经完全亢奋了之后告诉他们我其实是一个很腼腆的人，是一个很害怕当众讲话的人，这时候他们都会笑，但我自己知道这其实是大实话。

■ 北京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让你反感的是哪些？你对北京的评价是什么？有没有过要“逃离北京”的念头？

*北京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有很多很好玩，很优秀，很过瘾的人，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土著的。在过去外地人不是很多的时候，我来北京也感觉到北京人不排斥外地人，比较大气。当然这种性格的另一面是，很多北京人都是大爷范儿，比如北京的出租司机很少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是一个服务行业，他们好像总以为自己是有一技傍身的技术行业人员，而且是派头比较大的那种骨干工程师之类的。

除了人，北京的一切都让我反感，交通就不用再提了，城市规划难以置信地变态，好像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在市中心有那么多封闭式公路了，其结果是行人在北京过一条马路，用上十几二十分钟去绕一个远处的过街天桥是很常见的事情。还有些笨蛋试图在这样灭绝人性的城市设计条件下，让步行的市民“文明”上街，不横穿马路，惨败之后只好把其他城市里最常见的矮隔离墩统统撤掉，换上了北京特色的，高达一米半的铁栏杆，大家这才“文明”了。

空气污染是另一个让人特别受不了的地方，虽然这两年官方的说法好像是“蓝天率”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这个样子，但是每一次真的有蓝天的时候，大家都会特没见过世面地感慨说，今天天真蓝啊！

逃离北京的念头？每天至少一次，但因为种种原因走不了。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活得挺失败的。

■你有苦难的童年吗？你的童年忧郁吗？

*我没有什么苦难的童年，童年也没怎么忧郁，当然，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谁的童年是特别好的，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顿肉。

■你拿自己当个人物了吗？

*我一直都拿自己当个人物啊。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坚信我是个人物了，在我最倒霉最潦倒的时候，我也坚信我是个人物。这和是不是成名，是不是有钱，是不是当选年度时尚先生，是不是有幸和芙蓉姐姐并列年度十大网络红人之类的，没什么关系。

■那你为什么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呢？有什么原因吗？

*其实开始我还是比较谨慎的，但后来发现无论到哪里，我都很少发现能让我佩服的人，不是没有，只是确实很少。最后，我不得不对自己说，行，你这样的，就算是个人物了。

■如果你人到中年仍然一事无成，你也会觉得你是个人物吗？

*当然，我同情那些以成败论英雄的人。

■老罗，如果有一天电视台邀请你去当综艺节目主持人，而且待遇从优，你会考虑去么？

*会考虑，如果电视台的言论尺度跟我的讲台差不多。

■你所指的制式教育是什么概念？你自己的退学是否与此有关？你是否赞成更多的孩子像你一样退学？

*当一种教育制度要求全国几亿的青少年都认为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他们指定的那个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制式教育。我不反对孩子们退学，但最好不要放弃读书和自我教育。另外父母都是文盲的家庭，孩子上学可能会好些，至少能识字。

■中国的中学教育最失败的是什么？你当初退学是不是怕自己也从半傻逼被培养成彻头彻尾的傻逼？

*看不出哪一点最失败，觉得几乎全都失败。我退学不是怕自己被培养成傻逼，而是没有耐心跟那些笨教师和笨制度较劲儿了。

■有些人退学之后成功了，比如韩寒，比如你，但更多的人退学之后没什么成就。如果一个人选择退学，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

*我觉得这个问题反映了一个我很讨厌的社会现实，为什么要把所谓的“成功”看得那么重要呢？一个人，非要出人头地才是活得“成功”吗？以韩寒的头脑和思想，他要是没有“成功”，也是一个牛逼青年，只是默默地牛就是了。我希望那些退学的年轻人先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正直的、善良的、有原则的、头脑清楚的、明辨是非的人，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去考虑什么“成功”。

■如何定义愤青这个概念啊？

*愤青字面上就是愤怒的青年，但是词汇的用法和感觉是会改变的。我小的时候，一个美国青年大骂美国政府、一个苏联青年大骂苏联政府，通常被叫做“愤青”。但是现在一个中国青年大骂美国政府我们也把他叫做“愤青”，我觉得这很滑稽。我自己理解的愤青是永远对现状和旧有体制不满的，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热血青年。不是那些整天叫嚣用原子弹解决中日问题、中美问题、台湾问题的弱智青年。

■会不会有人说你思想偏激？

*当然有，很多。很多中国人有一种思维公式，认为性格激烈就会导致思想偏激。我觉得我写文章措辞很激烈，但我思想不偏激。很多人只要看到一个人激动，就说他偏激，我想他们只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偏激”所以才这样说。偏激的意思是偏颇、极端、过火，可是我虽然激动，却没有过火的想法。我说一坨屎臭，就有笨蛋说，你太偏激了，那我应该说“有点味儿”才不偏激吗？我不偏颇不极端，又时时保持热情，所以我觉得我是“正激”。胡平老师说过一句很让我产生共鸣的话，“有的人有了理智就丧失热情，有了热情就失去理智”。我觉得真正理想的状态是，充满热情，同时保持理性，或充满理性，同时保持热情。我总跟我的学生们说，你们一看我激动，就觉得我偏激，这是你们被社会灌输的思维公式。很多人做这种反应从来不过脑子，看到一个东西就用原有的公式回应，这已经不像心理反应了，简直是生理反应。一看到有人激动就说这个人偏激的人，最偏激。

■你会不会感慨自己生在一个平庸的、无聊的时代？

*我觉得一个人感情上希望自己生在某个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每个时代都有你可以做的事情，轰轰烈烈的时代是被牛逼轰轰的人创造出来的，你不甘于平庸的话，现在也可以去做轰轰烈烈的事。

■你觉得年轻一代的孩子，他们最缺的是什么？硬的骨头，还是别的什么？

*计划生育后出生的孩子，好像通常缺乏懂得忍让、懂得分享这样的品质，不过这不怪他们，谁让他们成长的时候没有兄弟姐妹呢？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的上几代人，猛生乱生比着生孩子，突然有一天说，哎呀，不能再这么生下去了，然后就勒令他们不许有兄弟姐妹。等这些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孤零零地，同时也是被娇惯长大了之后，又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自私？为什么不懂得关心别人？这不太孙子了吗？

■如果请你到一所普通的高中去开一门选修课，科目随你选，你会去吗，你会教给我们什么呢？如果你是教育者，你最希望青年掌握的是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1. 会去。

2. 由着我的性子教中文，因为我英文其实很烂，还是哑巴英语。

3. 希望他们学会思考，这比知识重要得多。

4. 一时没想到特别有效的方法，简单的方法是读读《人民日报》，听听《新闻联播》，再看看孔庆东的博客。如果觉得基本上句句都不像人话，那就差不多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

■如果你有机会进入主流教育，大中小学，你会选择哪一个？为什么？

*我会选择小学，因为脑子被弄坏了的人长大了之后能改造回来的不是很多。

■罗老师，人生让你感到“愤怒”以外，有没有感动和温暖？我觉得你所要表达的很多东西是严肃的，只是因为有了幽默的调侃读着就比较轻松。

*希望你能想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一般说来，对假、恶、丑的愤怒都是因为对真、善、美的热爱。只是有些人不喜欢对公众展示温情的那一面就是了。

■在人们都比较在乎的事情上你最不在乎什么？

*很多，比如断子绝孙、戴绿帽子，被认为不爱国、不孝等等。

■反之，你比较在乎的是什么？

*在公平、自由、尊严方面受到侵犯。

■你认为20年来生活环境改变最大的是哪些方面？

*物资丰富，交通堵塞，大部分人买不起房子，医院见死不救，环境污染。

■随之精神生活与交往的改变是哪些方面？

*几乎是全面性的社会道德沦丧，总算我小时候还见识过几年那种还算有底线的社会。

■对于这些变化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清楚根源在哪儿却不能直说，只能哭笑不得地打打擦边球。

■你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特别崇尚物质和金钱的吗？

*我们国家尤其是，有些国家好一些。

■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资产状况与他的尊严成正比？

*一群傻逼商人凑在一起的时候。

1、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诚实是一个奢侈的品质。

2、很多年前，德国有一个畅销书作家，以这个名字（《我的奋斗》）写了一本超级畅销书，卖了1000多万册，很多同学都知道，（此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3、我的这个标题（我的奋斗）在一些地方引起了争议，他说你为什么用希特勒用过的标题？我总是跟他们讲，因为我年纪越大，就越意识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在我的一生中，我注意到，基本上我接触的那些好人通常都很懒，那些正直的、伟大的很了不起的通常都很懒，我接触的很多坏蛋都很勤奋。一些流氓企业家、流氓政客、流氓混混，他们都非常地勤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所以我就想，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坏人用过“我的奋斗”这样的名义，我们应该找一些好人，令他们奋斗起来。那么我就从我做起，把这次的巡讲定成了“我的奋斗”这样一个主题。既然这个讲座叫“我的奋斗”，我就不免从我苦难的童年开始说起，也就是在吉林省长大的这个岁月。

4、我是一个活得很谨慎的，很多人在互联网上所听到我嚣张跋扈的一面，不知道我做事还有勇有谋。所以你一定要学出个样来，不要学皮毛，免得出去被人砍死。

5、所有这些经济活动都没有让我赚到钱，主要是我对他们缺乏热情。

6、就这样稀里糊涂到了二十多岁，有一点青春期的迷惘还没退，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但是我比较幸运，我有一个姐姐在天津，闲着一套房子，她说，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让你出来做什么。但是小城镇的孩子就是这样，在成长过程中可能读过很多书，自命不凡，但是到了二十七八岁、三十来岁一事无成呢，可能娶了老婆之后，老婆孩子热炕头，这辈子就颓掉了，等到了四十来岁，如果心甘情愿你这辈子一事无成，没有关系，只要活得开心就好。我们生命来到世间，只要自己活得开心就好。但是，如果你不甘心，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到时候又蠢蠢地重新萌发出来，你意识到，可能就比较痛苦。所以她就说，我也不知道让你出来干什么，但至少你应该出来见见世面，不要在乡下像一个土鳖一样活下去。于是我就到了天津。

7、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一个男人到了三十岁一事无成，总会感受到一些异样的眼光。

8、一个男人到了快三十岁一事无成，像个花花公子一样，同时又很穷，所以这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地球上最糟糕的组合，花花公子+没钱，这是人类能想象的最愚蠢的组合，这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于是他们（亲戚们）看我的眼神就很怪。

9、在我热爱妇女的一生中，每一次我人生取得阶段性进步，动力基本上都是来自妇女。

10、那个时候我的很多同龄人二十二岁走进社会，到了二十七岁即便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事业上的基础已经打好了，所以他们做起一些事情比较顺利，比较顺理成章。但是我从十七八岁不到就一直玩到了二十七八，所以没有打下事业上的基础，这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就很难。但我不为此后悔，当年是这样，直到今天也是一样，我总觉得年轻的时候你应该多玩一玩，年轻人本来就是玩的，然后长大了对社会对家庭承担起一些责任，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人生轨迹。

11、我注意到我的很多好朋友、老同学有些很糟糕，二十多岁的时候应该玩不玩，居然到了二十七岁没谈过恋爱，一天都没玩过，埋头就跟傻子一样学习，然后呢三十多岁谈了个恋爱，下个月就结了婚，因为已经等不了了，捡到篮子里就是菜了这种心理。结了婚，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帮笨蛋呢，到了三十五六突然就懵了，哎，你看人家年轻的时候那么开心，我年轻的时候一天都没高兴过，光读书了。于是这帮笨蛋反应迟钝，开始想起了要玩了，三十五六岁的男人还能玩什么，于是出去搞外遇。所以我回到老家见到这些老同学，我总是痛心疾首地和他们说，你看看你们，怎么能在生命的每一阶段都做错呢。年轻时候你应该玩，结果你不玩，和傻子一样看书不谈恋爱，浪费资源。然后到了三十五六，对家庭、对亲人、对社会都要承担一些责任了，应该靠谱一点了，结果又去搞外遇。我每次说他们，他们都面红耳赤，然后说多了不爱听，站起来，领着外遇就走了。

12、我当时二十七岁呢，事业上没有任何基础，有一阵傻，也跑到书店，个体书店脏乎乎的书柜上，翻过一些愚蠢的书籍，比如说“快速致富法”，一听就是骗傻子的，在那看过几本，很苦闷，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时候我在天津外院认识了几个孩子，到了北京上过一个叫新东方的私立学校的课程，然后回来跟我说，罗哥，那儿挺适合你的，

应该去试试。然后我就说，那儿是干嘛的。他们就说，你可以到那儿当英语教师。我当时就很崩溃，我说，我生平最讨厌两个，第一是老师，第二是英语，现在你让我去当英语老师，我怎么得罪你了。然后他们就给我讲了无数个理由，每一个我都听得很不耐烦，我就回答滚，回答了十几个滚。最后他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小声很挣扎一样地说，听说这个机构的老师有百万的年薪。我当时就一下不行了，因为“快速致富法”上告诉我的只不过年薪二三十万。然后我一下就站起来了，我说，如果说谁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百万的年薪，无论让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慎重的考虑一下，毕竟我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当时慎重考虑的结果就是到了北京，听了他们的这样大型的公开的演讲，然后听了他们的一些免费的视听课程，看了媒体关于这个机构的报道。当年新东方这个机构吸引我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传说中的百万年薪，实际上后来证实没有那么多高，我做到了一线的最好的教师也只不过五六十万，但这个收入我始终还是满意的。还有一个这个学校是北大的一群穷教师出来打造的在社会上很成功的理想主义创业者的光环，这个东西非常吸引我，我被这两个东西迷惑。然后我在零零年的时候回家跟父母说，我要用一年的时间把自己关起来备课，然后去到一个私立学校当英语教师。

13、那些励志的、所谓成功学的那些书，这些东西本身都是没有内容没有营养没有内涵很垃圾的东西，但是你定下一个目标的时候，用来给自己打打气，当成一个精神鸦片来用还是管用的。我建议大家偶尔看看成功学的书，当成是工具书给自己打打气，但千万不要着迷进去，因为一般来讲成功学的那些书都是搞邪教的人写的。全世界的成功学写了那么多，发行了几亿种，归根结底他们都是没有思想没有内涵没有营养，就一句话嘛，全世界的成功学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只要你努力就能成功，这是一句屁话，由于我们生来就不平等，有些人综合条件差一些，怎么努力都不成功，你不能说他不努力，这是很害人的。所以我平时绝对不看这种垃圾书籍，但是当你定下一个坚定目标，拿他当工具书还是可以的。

14、我随手拿起了一本翻，这种书你们将来买几本就知道，连篇累牍的精神鸦片特别管用。我当时一翻翻了三页就看到了李敖年轻时写的一句话，他给自己打气的话，“不怕苦吃苦半辈子，怕吃苦吃苦一辈子”。你知道处在我那种状况下看到这句话那种感觉就像被雷劈中了一样，我就嚎啕大哭，然后跪在地上用脑袋撞墙，然后满地打滚，然后就感觉冥冥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让一位台湾作家在几十年前

写了一句话就是留着给我看的。那种诡异的感觉就像你们失恋的时候，走在马路上听流行歌曲，听情歌，觉得每句歌词都是唱你的，是那种神秘的感觉，然后我就感觉是有种神秘的力量在引导我上进。于是嚎啕大哭了半天，眼泪鼻涕冷汗全出来了，冲到卫生间里洗了一个冷水澡，出来抽了自己两个耳光，坐在电脑前面很冷静，又背了三天单词做了三天题，到了第四天再一次面临下一次的放弃，基本上我在那儿的四五个月期间，全都是三天一放弃。然后到了下一个三天的时候，我决定老子不干了，出去玩去，收拾好东西到门口，这时候我问你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你一看还拿起那本书，翻了三页，又看到那句话，“不怕苦吃苦半辈子，怕吃苦吃苦一辈子”，这时候还管不管用？肯定不管用，一看心想，MD就是上了你这句话的当了，受了三天罪，你这个骗子，害人的东西，这个李敖是干嘛的把他抓起来，就是这个感觉。所以呢一定不能看看过的，把那个书扔到一边，为什么买一百多斤呢，就是这个原因，扔到一边去，随便又拿起另外一本，不用挑，全是精神鸦片。随便翻，翻了三页，又看到一句话，说“失败的原因只有一种，就是半途而废”。我当时心想，哇！然后嚎啕大哭，各种液体全下来了，满地打滚撞墙，丑态整个重复一遍。冲到卫生间，甚至穿着衣服就冲了个冷水澡，出来抽自己两个耳光，把出去能见人的体面干净点的衣服全扔了，穿着破了一个洞的秋裤老老实实坐在那儿背单词。就是这样，非常的爽。每三天崩溃一次，每三天给自己打一个精神鸦片，其实中间也出去过一次，然后很快就悔悟了很快就回来。到最后的时候，买的这一百多斤书就只剩两三本没碰过了，这个量卡得挺危险的，如果可能差那么两三本可能我就半途而废了，因为我年轻时候半途而废的经历非常多，这方面我是个专家。在这样的情况下，终于坚持到了最后，把所有的课程都背过了，考试卷考过了备课备过了，对着墙讲了二三十遍，录下来又讲了十几遍，然后放自己的录音听，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惨不忍听，然后纠正道十几遍的时候，基本上非常满意了，我觉得已经达到了任何一个新东方教师的水准，这时候我呕心沥血写了一个一万多字的求职信发到新东方的老板俞敏洪那里，然后他看完了很喜欢，亲自打电话约我去他那里去谈话。

15、我经常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庆幸，就是以我的口才和煽动性，没去做邪教，（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幸事，基本上我要是搞邪教，那么李老师就得失业了。

16、我在04-05年的时候当选过百度年度十大风云人物，准确的讲，04年的时候是十大网络红人，05年的时候是十大风云人物，注意，这个是有区别的，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04年的十大网络红人并列的是谁呢，第一是FRJJ，往下是什么GG什么MM，我是排第七，江湖人称七爷。05年的时候百度可能意识到我骨子里还是很严肃的人，不是那种红人界的，于是他就把我放到十大风云人物里，并列的就好一些，相对体面一些，比如说霍英东、邵逸夫、韩寒，还有反一革命剽窃犯郭敬明老师。

17、牛博网甚至没有低俗内容。你们知道什么是低俗内容吗？很多孩子假纯在那摇头，你敢说你不知道什么是低俗内容？在中国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新浪网易搜狐腾讯，这是鼎鼎有名的上市公司，全国性的门户网站，你看上面全是连篇累牍的走光照、偷拍照、半裸女，因为全裸女违法，治好贴半裸女，非常的无聊。我并不是说我假正经反对这些东西，我年轻的时候也常看，我去黄站看我不去一个门户网站看，听懂了吧？比如说我想看点黄的，我不会打开中央电视台在那看，我可能会出去找一盘黄色录像看，听懂了吧。这个地球上据我所知只有大陆全国性的门户网站上面全是半裸女的图片，你们注意到雅虎是一个世界级的网站，雅虎美国你去看英文网站一个半裸女图都没有，都是很正经的内容，大站有大站的风度和社会责任感。在中国就没有这个东西，你看四大门户网站上全是半裸女的东西，就连雅虎中国一雅虎的中文版，全是半裸女的东西。一个劲点，不停地下一张下一张，点到最后你看累了不点了，它就会弹出一个窗口说“还有哦，再点一下还有哦”，非常过瘾。后来我搞互联网以后，经常会碰到国外的IT业的同行在北京有一些互联网的年会，在酒会上碰见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老罗你们中国为什么所有国家级门户网站上豆邮这些东西？搞得我很难看，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因为我们是黄种人。你要在美国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黄站就是像样的黄站，不黄站就是不黄站，哪儿有国家级的门户上全是半裸女，非常的丢人，是吧。

18、（厦门-事件）我们当然有些压力但是我们忍住了，没有删帖。我这个网站做到今天从来不主动删帖，我身上有很多闪光的优秀品质，大部分被低估，有些被高估，被高估的第一条就是勇气，很多人一位我特别勇敢，其实我只是有一点勇敢，我党要求我们网站删帖，我从来没有抗过命，打电话让删就删，来短信让删就删，来邮件让删就删，MSN让删就删，从来没有抗命过，但是这在中国已经是难能

可贵，因为所有的中国网站为了保全自己都会主动删帖，我也想保全网站，但是我不想妨碍他们的言论自由，我就不删贴。

19、在（厦门游行）前一天，北峰老师估计这可能会给牛博网带来严重的麻烦，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我要做现场直播了，老罗你要反对我就不做了，我说你随便。他说，那我就不做了，我说你随便。他说，那我就做了，我说你随便。他说那我明白了，我说你随便。然后他就坐飞机连夜杀过去了，第二天做了一场现场直播。我估计我这个网站保不住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去办公室坐在电脑前，想亲眼目睹它关闭的整个过程。但是实际上在当时已经不新鲜了，因为之前关了两次，再关就第三次了，也不是说很惊讶。然后一直坐在那看，直到下午六点钟，这个网站没有被关闭，而且有关部门的任何一位同志都没跟我联系。我就感觉很奇怪，下班前我忍不住骚扰他们，我说今天没有什么消息吗？他说你不就想问厦门-事件吗。我说对呀，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废话，我是吃什么饭的。我说没有消息吗？他说没有消息。我说那我就不删了，他说你随便。我说那我删了，他说你随便。我说那我回家睡觉了，他说你随便。那我就把电脑关了，回家睡觉去了。

20、我是想说的一个意思是，很多时候你生在一个小镇，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钱，走进社会也没有什么人帮你，所以你可能会感觉你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你有所坚持，不相信前辈们跟你讲的“如果你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这些恶心的东西，你坚持做你年轻时候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很多时候也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21、我一直想跟同学们讲的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走进这个恶心社会之前，很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是正直的，因为这个世界很奇怪，即使是坏人教育孩子的时候也会教育他，长大了要做一个好人。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坏蛋教育孩子说你长大了一定要当一个臭流氓，他们做好人咱们做流氓，咱们家就发了。没有见过这么教育孩子的，都是教育孩子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好人，但是你带着这种想法，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改变这个世界，你问他们长大了想做什么，想做飞行员的，想做宇航员的，想做外交官的，都是充满着这种远大的理想主义的志向，很少有人说我想掏大粪我想要流氓我想办证我想卖壮阳药我想贴电线杆，没有这样的。但是二十多岁走进社会，越是正直、耿直越是有才华的就会发现，由于自己的耿直20多

岁到30岁一事无成，在今天这个普遍恶心的中国社会里，成年人的社会非常的恶心，尽管你有能力有才华一事无成，因为你不会算计不会拍马屁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那些狡猾的圆滑世故的年纪轻轻就圆滑世故的让人感到可怕的那帮孩子二十多岁走进社会开始钻营，到了三十岁，过得非常好，家里要什么有什么，二奶奶有六个，就是这样。所以，对于正直的人如果他不是足够坚强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所以我的很多同龄人老朋友老同学到了三十岁一直在挣扎是做一个流氓还是做一个好人挺不下去了，一狠心做了一个流氓。做了一个流氓，如果他们充满了负罪感，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我还挺乐观的，结果这帮流氓呢一旦产生幻觉，觉得这就是成熟，于是他跟年轻人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后来意识到这是不对的，幼稚的。（他们）就这样毒害下一代，我看了无数这种例子，所以每年我回去的时候，那些大小在一起长大的那种感情和这帮流氓生意人流氓政客，我一回去就很热情，张罗一起吃个饭啊什么的，我就问他们，你们不是娘请的时候都相信能改变世界吗，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他们就很尴尬地笑了笑，什么改变世界，那不是小孩的想法吗，别扯了，我们谁也改变不了世界。我有的时候会忍，有的时候激动了就撕破脸皮和他们说，我说别客气了，你还是改变了世界。你看你三十多岁成了一个恶心的，成了这个社会芸芸众生的那些操蛋的人中的一个，你怎么能够说你没有改变世界呢？你已经把世界变得恶心了一点点，因为地球上又多了一个恶心的。如果你的一生没有做任何伟大的事业，没有赚到钱，也没有出名，但是一生耿直刚正不阿，一辈子没有成就伟大的事业，但是拼着老命把自己老婆孩子家人勉强照顾好了，你的一生有没有改变世界？如果你这样活到了七八十岁没有成就任何伟大事业梗着脖子去世了，有没有改变世界啊，还是有的，因为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好人，所以因为你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了一点点。听懂了吗，每一个生命来到时间，都注定会有改变世界的宿命，你别无选择。有的人不服气，说MD我自杀，看我改变不改变世界，你自杀也把这个世界的自杀率提高了一点点，还是改变了世界。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注定改变世界没有一个人例外。如果你一辈子做一个好人，你把世界变得美好了一点点，可能你没有成就伟大的事业；如果你变成了一个恶心的小官僚。你说啊我也没有把世界变得很惨吗，我又不像希特勒杀了那么多人，但你还是把世界改变了，变得恶心了一点点。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能改变世界，要相信自己能做出点事情总能够做出来。

22、(汉武帝刘秀视察军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当我们人生道路上面临挫折打击失败摧残的时候，不要愤怒不要控诉不要沮丧不要抱怨也不要难过不要流泪，埋头默默擦亮你的武器，准备下一次的战斗。

23、（老朋友们说）你看你在英语培训界这么多年，人脉、影响、知名度全有了，师资资源老师老朋友也全都有，人格闪亮的令人嫉妒，声誉好的令人发指。我听得晕乎乎，我说我是这样吗，他们说。然后就晕了，他们说，你不办学校谁办学校。然后我一下拍案而起，我说是，我不办学校人民都不答应。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人传出来，然后见媒体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还傻了吧唧把这话都说了，结果那个记者被看晕了，回去傻了吧唧全发出来了，非常过瘾，《新京报》就是这么发的当时。

24、出来办这个学校，发现有个事情还是很讨厌的，我的性格是不愿意张罗一坛子事情，因为你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免不了跟流氓打交道跟那些市佻的生意人打交道跟黑社会打交道，这些其实挺讨厌的。一旦做起来又发现很有趣，只是寻找资金这一块给我带来巨大的困惑，因为虽然我能砍能忽悠但是我擅长对着衣冠楚楚的一对人坐在那儿讲骗他为我投资。而且每次去我都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感觉像要饭的。可是别人告诉我，一个新兴企业拉投资是很正常的，人家给你投也不是施舍给你，他是看好你的长远利益。尽管有很多劝说还有内行的高人指点，但每次去谈都很不舒服。而且谈了两三个月，刚刚有一点眉目，我都烦的不行，别人又告诉我说，你这种大机构的投资等上一年都很正常，所以一定要耐心等着，所以我就有点受不了了。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转机，我都考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了，来了个转机。我有个东北老家的朋友，也是吉林人在延吉的。这个朋友做生意当年去了非洲，被人骗了骗的最后一分钱都没剩，没脸回家，被迫在那扎根留下了。当时没收订金就帮人进了两台烤面包的设备，结果呢到了那以后非常朋友不要了，这是做人有问题是把，然后他又没收订金，砸在自己受理了，没办法堆进仓库放了不到两年一年多，过了一年多他去忙别的事业，过来一看仓库里的机器开始生锈了，于是他就慌了手脚，心想，这么贵的机器生锈了不久废了吗，于是擦亮了之后，跟几个朋友试着烤一些面包卖看行不行，结果到了今年已经成了尼日利亚第二大连锁店的老板，在非洲成了公认的面包二大王，大大王是一个台湾女人做了半个世纪，成了大王，（我那朋友）成了二大王。我跟他十多年没有联系了，他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突然杀到了北

京，说是旅游，然后给我打电话约我出来吃饭，我就去了。他说你忙什么我说我忙着做学校。他说怎么样，我说还行别的都挺顺的，就是投资没到位。然后他说需要多少钱，我就说了个数字，做民办培训呢，资金门槛很低，几百万就够了，我就说了一个数字。他听了之后说啊才几百万，是人民币吧，我说对，他第二天就打了一笔钱到我的账户上，他说你随便折腾，赔了算我的，然后一张机票就走了，到现在没联系。

25、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他该做的事不是来躲枪子的。很多长辈不断地告诉年轻人说枪打出头鸟，如果他这个忠告有意义，那就是假定所有的鸟都怕被枪打，我们不热衷于被枪杀，但是如果做你正确的事情注定被枪杀，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有的鸟来到世间不是为了躲枪子的，你们是职业躲枪子的，你们这帮傻鸟来到世间就是为了躲枪子的，我呢是为了做我该做的事。如果注定挨枪子就认了，如果不挨枪子我也很高兴，就是这样。

26、他不是个坏人，也不是个好人，他是一个生意人。

27、如果我们跨入一个行业的时候，行业里面有半数在耍流氓，半熟不在耍流氓，踏踏实实地做，你作为这个领域的新人，是要流氓容易挣钱还是不要流氓容易挣钱？如果你进入这个行业有99%的同行在耍流氓骗人，你是之少数剩下的1%不到的，你去宣传推广，强调你的不流氓，你去宣传推广而且你做到了，有没有戏？

28、《经济学人》在08年说过一个中国企业的毛氏管理现象，这些企业的老总走的都是当年毛泽东走的路线，拉过来一些热血青年一起跟着创业然后对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第一绘制美好的未来，给你讲一个理想化的明天，第二呢少给钱，第三多干活，就是骗这些热血青年。毛泽东打天下就是用的这种路数。中国的企业家今天普遍采用这种方式，我们这里虽然是一个没有实现盈利勉强打平的机构，我们这里五险一金全有，加班费主动给，没有说让你去填单子，都是主动给。然后所有大机构能实现的东西我们都实现了。除了我们不是大机构，我们从一出道，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像大机构，除了不是大机构是吧，就这么狠。我们这个机构和一些上市公司还用盗版软件不同，从创业的第一天没用过一个盗版的windows，一个office，昂贵的全都是买的正版，所以我们实现了用六个月打平之后，我给全公司的职员开会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们不要难过，虽然我们还没有实现赢利，一直打平，不要难过，我告诉你，如果我像任何一个民营培

训机构的老板那样，克扣工资，不给你加班费，给你耍流氓，没有五险一金，没有什么体检福利全都取消的话，我们早就盈利了。所以，如果我们用盗版软件，我们盈利已经惊人了。然后他们都感到很振奋，很鼓舞。

29、所以采用这种方式去做（即上一条），假期我们找到了7、80人的托福GRE班，已经成了行业里异军突起的老二了。按这个趋势下去，哼哼，什么时候做老大呢，我不急，是吧，我还年轻，我不急。还有就是，我们的退班率是5%，开课以后又学员对我们的课不满意，就退班的，任何机构都有，我们是5%，远远低于行业平均，现在每招到的100个学生里，有12个是老生推荐的，这也是远远高于行业的标准。我就按照这个思路，一直走下去，坚信，我们的明天无比的辉煌。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有一天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老罗英语培训机构”或者“老罗英语培训机构”的分支打出神奇，秘笈，魔法，七天搞定和不用背单词这样的口号，你就知道我们完蛋了，那时候已经成了臭流氓了。但我相信绝不会有那么一天，只要我还在这个机构，欢迎大家监督。

30、我作为一个土鳖，创业的时候采用了两个好玩的方式，第一呢尽可能的把这个机构弄得洋气一点。一听洋气这就是土鳖的思路，对吧。我这土鳖由于创业的时候不自信想了一个洋气的就是，我在我的这些老朋友老同事老教师里面寻找我的创业伙伴的时候，精心挑选了有留洋背景的。尽管有很多老师没有留洋背景讲课也讲得无比优秀，比如罗老师。但是我还是刻意挑选了一批有留洋背景的朋友参与一起创业，因为传说中一个土鳖领着一群海龟一起创业是很美好的景象，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我创办这个机构的时候，因为土鳖的不自信，我给公司的名字起了洋气一些，于是我起了个“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结果这名字起得在中国严重水土不服。我拿到哪儿，人都说很土。有时候我们在路边脏乎乎的很土的饭馆吃饭，吃完饭，让他开个发票，很土的饭馆吃的很土的饭菜，然后很土的服务员去给我妈开发票，我递给他名片说按这个名字去开发票，他一看就扑哧乐了，说什么公司，这么土是吧。我们就知道，这一步走错了，这个名字在中国严重水土不服。可我这个土鳖为什么觉得“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很洋气呢？因为我精心准备过，我发现世界500强的好多企业都叫这个名字，比如说麦肯锡，它的全名是麦肯锡和他的朋友，摩根斯坦利，它的全称是摩根斯坦利和他的朋友们，所以我想我叫“老罗和他的朋友们”一听就是世界500强

嘛。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名字在中国严重水土不服，到哪都说这是个土鳖名字。那我们就认了，名字不好有什么关系是吧，只要真正是一群朋友在一起坚持热情创业，做自己年轻时候认为是正确的，保证要发财要赚钱但要保证每一笔钱都是干净的，是吧就是这样。

Table of Contents

自序——像坏人一样勤奋

第一部分 第1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

第一部分 第2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2)

第一部分 第3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3)

第一部分 第4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4)

第一部分 第5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5)

第一部分 第6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6)

第一部分 第7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7)

第一部分 第8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8)

第一部分 第9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9)

第一部分 第10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0)

第一部分 第11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1)

第一部分 第12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2)

第一部分 第13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3)

第一部分 第14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4)

第一部分 第15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5)

第一部分 第16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6)

第一部分 第17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7)

第一部分 第18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8)

第一部分 第19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9)

第一部分 第20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20)

第一部分 第21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21)

第一部分 第22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22)

第二部分 第23节：正版“老罗语录”(1)

第二部分 第24节：正版“老罗语录”(2)

第二部分 第25节：访谈及对话录精选(1)

第二部分 第26节：访谈及对话录精选(2)

第二部分 第27节：访谈及对话录精选(3)

第二部分 第28节：访谈及对话录精选(4)

第二部分 第29节：访谈及对话录精选(5)

第二部分 第30节：访谈及对话录精选(6)

第三部分 第31节：我的奋斗（高校巡讲不完全文字版）